

第三章 六 年代台灣小說死亡主題成因

文學是時代的反應，一個特定的歷史時代和社會背景，自會產生特定性質和內容的時代作品。一般論者為論述方便，採以每十年為一期，斷代無法十分符合歷史變遷軌跡的劃分方式，如五 年代的反共文學，六 年代的現代文學，七 年代的鄉土文學，八 年代的多元文化期等等，¹即是闡釋一個與社會相呼應的時代文學特性。因為文學代表著人類的一種精神文化現象，是與人類所生存的社會並存的，社會環境與精神文化將會約制創作者的思想趨向。本章將考察六 年代台灣小說死亡主題之呈現其背景成因素包括政治、經濟面的衝擊，以及作家所面臨的處境問題與其思想形塑結果之影響。

由於台灣的歷史既特殊又複雜，在探討台灣時代背景時，需從本土的與外來的兩條軸線進行。因為台灣歷史的特殊性，雖然同樣是中國人，但台灣人不管在政治上、文化上、思想上、生活上或邁向現代化過程，皆有異於隨國民政府來台的二百萬軍民，台灣在重回祖國懷抱，大陸與台灣人在融合過程中，我們看到的兩地阻隔，不僅是五十年的異族統治尷尬，從整個台灣歷史來看，祖國歷代執政者，對台灣向來不重視，並沒有用心經營，它一直是被擺在「邊陲」位置，所以各自發展結果都有自己的獨特性存在。因此在論說當中，有時會將本土的與外來的作分述以符合實際狀況。

第一節 時代背景

本節分別從政治面及經濟面來了解六 年代社會的背景情況。由於台灣的歷史既特殊又複雜，於脫離殖民統治重回祖國懷抱後，因為五 年代初雷厲風行的白色恐怖政策，使作家刻意或被迫避開文學的社會性（呂正惠 93），造成

¹ 此十年一期的分法參考許俊雅〈戰後台灣小說的階段性變化〉一文。收於封德屏編《台灣文學發展現象》（台北：文建會，1996年），頁 77-78。

台灣作家對社會的疏離、對政治的冷漠。就經濟建設而言，從土地政策的實行、美援的介入，台灣自一個傳統的農業社會轉向工業現代社會，價值判斷與道德標準無可避免的皆受到相當程度影響與衝擊。

一、政治面考察

(一) 臺灣政權替換與歸屬

翻開台灣的歷史，我們不免心痛那一頁滄桑血淚。自十七世紀荷蘭侵佔台灣殖民統治三十八年（1624年 - 1662年），一六二六年西班牙艦隊登陸，佔據北部台灣（1626年 - 1642年）；鴉片戰爭導致天津條約（1858年）、北京條約（1860年）列強開港，1895年甲午之戰台灣割讓，受到日本殖民長達五十年，直到國民政府遷台初期。數百年來台灣的執政者，一直把台灣當成軍事據點或經濟穀倉，鮮少作久留經營之策，皆存過客心態，加上台灣是以漢人移民²為主所形成的社會，先住民在漢人大量移民情況下，彼此的接觸從衝突、合作到同化的融合過程，因為長期雜居、通婚形成「漢番雜居」的多種族移墾社會。台灣四百年來處於異族不斷侵擾及佔領的狀態，鑄造了獨異的台灣性格，³這樣的

² 「臺灣」最早的史籍記載是三國時代的吳國黃龍二年（西元230年）稱夷洲，夷洲究指何處？學者有不同看法，但大多數以為指的即是臺灣。而漢人在臺灣地區的活動，到宋代才有明確的記載，隨著大陸人民的遷居，元朝正式在澎湖設立巡檢司，秩九品。明代內地農民為逃避賦稅重擔，遷居澎湖的漢人更多，崇禎元年（西元一六二八年）海盜兼海商的鄭芝龍就撫於明朝政府，當時福建連年旱災，鄭芝龍曾招募大批飢民至臺墾荒，但人數亦僅數萬之多。臺灣漢族人口迅速增加是在鄭成功治台期間，大批軍事移民及民間移民來臺，據估計清康熙二十四年（西元一六八五年）在臺灣人口約七萬人，至一八一一年大量移民的結果，人口數已增至一八 萬。參見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台北：人間，1996年），頁17-122。清朝並且循鄭氏之例，在台灣設立學校，昭考生員（俗稱秀才），實施與閩粵兩省一樣的行政、法律和文化系統，同時厲行「護番保產」政策，保護先住民的生計，緩和民族間的衝突。參見尹章義《台灣發展史研究》（台北：聯經，1989年），頁3-7。

³ 葉石濤：《台灣文學史綱，序言》（高雄：春暉，2000年）。

性格背後意謂著台灣歷史的複雜度相當高。

考察六十年代文學普遍存在的悲涼、消極、蒼白、脫離現實的氣息，會發現二次大戰結束，台灣脫離日本殖民統治，回歸祖國，就一個被殖民半世紀之久的臺灣，對主體性的期待而言，台灣民眾應是熱切的，這是何等歡欣鼓舞的事情，但為何事情發展？呈現兩極的反應？

1945年台灣光復，全島居民無不以欣喜若狂等待國民政府的到來，葉榮鐘在〈台灣省光復前後的回憶〉描寫台胞歡迎國軍的偉大場面：

十月十六日，傳聞國軍抵達基隆，民眾爭先恐後，均以先睹祖國軍容為快，因而基隆碼頭人山人海。可是這一天裝載國軍的船艦終未入港，民眾等的望眼欲穿，有的甚至露宿碼頭以待。第二天……陸軍第七十軍，開始登陸，民眾喜極淚下，舉手高呼，其聲震動天地……抵達台北火車站時，一樣地也是人潮洶湧……三十萬市民夾道歡呼，處處都是感人畫面…。⁴

台灣馬路街景，重新裝飾以歡迎凱旋的國軍到來，連窮鄉僻壤，民眾都自動殺豬宰羊，親切慰勞官兵。可惜喜悅是那麼短暫，現實的殘酷迅即來臨。或許是兩地分由不同體制統治長達五十年，即使自清朝起同屬一版圖，但長期的海禁隔離，不管是文化、思想、生活方式皆有了明顯的差距。也或許期待過高，因為台灣在日人統治期間的不斷抗爭壓迫，自然理想化「祖國」的位階，正如吳濁流自傳性質的《無花果》，描述對祖國的思慕情感：

所謂的國家愛這個觀念，往往成為亡國人民之後，才會熾烈起來，也就是由於失去祖國而令人更加憧憬嚮往。⁵

⁴ 本文收入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文化，1995年），頁416。

⁵ 吳濁流：《無花果》（台北：前衛，1995年），頁162。

「祖國」對台灣人而言是一個地理名詞或意識主體的歸屬？從歷史回溯看，基本上，台灣是以漢族移民為主所形成的社會，來自大陸的移民不管是什麼原因東渡來台，那「原鄉」不管在血緣上、⁶意識上都是祖國，一般民眾對中國的實際了解即使不足，但那份民族血緣的紐帶意識可以說是超理論的存在，大家總把眼前苦難歲月的結束和復歸祖國的盼望，在主觀意識中緊密地聯結在一起。⁷ 即使在台灣蕞爾小島定居，心繫祖國亦不足奇，而且台灣在清朝（西元 1684 年）即納入中國版圖，地理上而言是一體，心理上是不能分割，那脫離異族統治的回歸，當然是「中國」這一正統的真主莫屬了。誠如葉榮鐘所說：

我們出生於割台以後，足未踏祖國的土地，眼未見祖國的山川，大陸上既無血族，亦無姻親。除文字歷史和傳統文化以外，找不出一點連繫。祖國只是觀念的產物，而沒有經驗的實感。……我們觀念上的祖國，到底是一個怎樣的國家，我們對祖國的觀念，由歷史文字而構成的，當然佔有相當的份量，但還不及由日本人的言動逼迫出來的切實。當我們抵抗日人的壓迫時，日人一句共通的恫嚇是『你們若不願做日本國民，返回支那去好了。』緣此日人的壓迫力愈大，台人孺慕祖國的感情也就愈切。⁸

這是臺灣人民認定的祖國情懷，日夜期盼代表祖國的國民政府來台接收。唯雙

⁶ 台灣移民大都來自閩粵兩省，初以祖籍地緣關係進行組合，同一祖籍的移民聚居一起，共同拓墾協力開發，初期因移民台灣多是一些單身漢，通過同鄉同族的關係結伴而來，不可能整個家庭或家族遷移台灣，較少形成單一姓氏的血緣村巷，但移民中仍保留某些血緣關係，只是較不嚴謹的血緣關係。移民社會經百年來的發展，社會結構從以地緣關係為主的組合轉變而為以宗族、血緣關係為主，不同祖籍的移民走向融合、認同台灣與認同祖籍的現象同時存在。見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頁 235。

⁷ 林書揚：《從二二八到五十年代白色恐怖》（台北：時報文化，1992年），頁 98。

⁸ 葉榮鐘：《台灣人物群像》（台北：時報文化，1995年），頁 419-420。

方接觸相處後，「實際的祖國」與「想像的祖國」有了認知上的落差，彼此的不適應便漸漸浮現，其間所引發的衝突與摩擦升高，造成緊張關係，對二二八事件的發生，實是暴風雨來臨的前奏曲。

（二）二二八的血腥風暴

當年陳儀出任臺灣行政長官後，採用異於大陸各省的制度，實行全省行政、司法、立法、軍事一元化的獨裁專制統治，引起臺灣人民極大的不滿，彷彿回到日據時代的總督制度，總攬一切的軍政大權，具有無上權威，主宰生殺號令。加上官場上的貪污腐化、營私舞弊，有所謂發國難財的「五子登科」，這些目無法紀的行為，與臺灣在受日本法治訓練後「路不拾遺，夜不閉戶」的境界相去甚遠。而軍警的橫行殘暴，違法亂紀形象帶給人民極大不安與衝擊。⁹作家張拓蕪曾回憶到：

臺灣在日本統治之下其最大的成就是夜不閉戶的良好治安，以飼養的家禽來說，居民都一籠籠，一簍簍放在自家門外，和腳踏車一樣從來不加鎖的，也從來沒有遺失過，然而自從中央軍進駐以後，雞籠、鴨簍以及腳踏車甚麼的便時常無故失蹤。¹⁰

軍紀敗壞，趁火打劫者多不勝數，如第七十軍的偷竊、詐騙、耍賴、恐嚇、搶劫、殺人....無所不為，被民間稱之為「賊仔兵」或「土匪仔兵」，¹¹祖國的形象損壞殆盡。

國民黨政府將台灣人血汗累積而由日本人遺留的官私產業、財富，以「日

⁹ 1946年2月《民報》新聞標題涉及軍警人員動輒開槍搶劫滋事者數起。見李筱峰〈戰後初期臺灣社會的文化衝突〉收於《臺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7年）頁297-298。

¹⁰ 張拓蕪〈我走過那一段歲月——二二八事件的回憶〉，《大成報》，（1990年11月21日副刊）。

¹¹ 見許極燉：《台灣近代發展史》（台北：前衛，1997年），頁480。

產」或「敵產」名義全部接管，¹²從戰敗的日本人手中接收資產之多，成為最大的繼承人，剝奪了臺灣人民經營的機會，而形成壟斷臺灣產業現象，所成立的貿易局與專賣局，獨攬內外貿易和煙酒公賣，和人民利益發生衝突。另一方面戰爭結束後，戰時生活的匱乏情形未見改善，反而物價節節上漲，民生物資供應短缺，甚至鬧起米荒，民眾掙扎在貧困邊緣的生活畫面實不難想像，這也是有人把二二八事件的暴動歸罪是經濟性的原因。

1947年2月27日下午七時許由燎原之星的查緝私煙的不當行為，終於爆發了臺灣人對國民政府的憤怒與不滿，旋及擴大為全省的暴動，本省籍與外省籍間的矛盾隔閡搬上檯面，以最原始而缺乏溝通餘地的流血衝突戲碼上演，對臺灣傷害至深的二二八悲劇。

同年3月9日國府援軍登陸，慘烈而無情的開始屠殺後，接著由黨、政、軍、憲、警聯合實行全面大搜捕，加以秘密殺害，這樣被殺害的人民不計其數。捕殺的對象除了直接參予暴動和抗議活動的台人，並且刻意搜捕「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大部分成員以及本省各地精英，包括民意代表、地方士紳、醫生、作家、教師等等，遇難的涵蓋了文化界、政治界、甚至新聞界人員。這種恫嚇式的統治，先是造成省籍間裂痕的加深，對知識份子而言，更在政府恐共反左翼心態下的報復行動與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的濫殺¹³中無奈的沉默以對。當時那種動輒得咎的恐怖情形，可以由國民黨省黨部主任李翼中回憶得到證明：

……國軍廿一師陸續抵基隆，分向各縣市進發，陳儀明令解散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又廣播宣佈戒嚴意旨。於是警察大隊別動隊，於各地嚴

¹² 接收詳情可參見同注 11，頁 461-467。

¹³ 根據白崇禧將軍回憶宣撫台灣的經過，當時警總參謀總長柯遠芬報告清鄉計劃，對懲罰方式是寧可枉殺九十九個，只要殺死一個真的就可以，並引用列寧的話：「對敵人寬大，就是對同志殘酷。」而遭到白將軍糾正，由此可見其處理心態。見賈廷詩等：《白崇禧先生訪問紀錄（下策）》（台北：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1989年），頁 567-568。

密搜索與事變之徒，即名流碩望青年學生亦不能倖免於繫獄，或逃匿者不勝算。中等以上學生以曾參與維持治安皆畏罪竄逃遍山谷，家人問生死、覓屍骨，奔走駭汗、啜泣閭巷。陳儀又大舉清鄉，更不免株連、誣告，或涉嫌而遭鞠訊，其禍者無慮數萬人。台人均躡氣吞聲，惟恐禍之將至。¹⁴

歷經五十年的被殖民、被壓榨，次等國民待遇的台灣人，之所以萬人空巷夾道迎接祖國，無冀是希望終於可以做自己的主人，可以接替日本人的位置，獲得生活安定，但接收成了「劫收」，據胡允恭（陳儀來台所任命的台灣長官公署宣傳委員會委員）在「台灣真相」的回憶，可知當時台灣省政府是怎樣對待台灣人民？

- (1) 工廠大半停閉，失業人數增加：國民政府接收數月後，工廠開了工，用人不及從前五分之一，而且百分之八十是用國內來的，因此失業人數驟增，政府始終沒有解決這個問題。
- (2) 各業統制，斬斷人民的生計：私人礦場，在日本殖民時期是被允許的，但勝利後，規定要賣給調整委員會，不得私人買賣，價格由官方規定。另外人民生產的食糖等，政府也統治專賣，定價尚不及成本。
- (3) 大量走私，米糧外溢，引起糧食的恐慌；而走私的包括商人乃至官吏。
- (4) 限制進出口商，使商業停頓。
- (5) 煙、酒、印刷業的統制，這原是小有產階級所經營，靠此業吃飯的人數也最多，私人經營完全廢止後，使千萬人的飯碗不保。¹⁵

對台灣人的私有產業，一律依「關於朝鮮及台灣人產業處理辦法」處理。先將台人私產全部予以沒收，需經提出證明自己非犯罪得來之財產，方得發還，造成人心恐慌，咸認為是政府將沒收其私產而對政府心生不滿。

¹⁴ 引自陳芳明〈二二八事件後的文學認同與論戰〉《聯合文學》，2001年4月第十七卷6期，頁162-163。

¹⁵ 參見戴國輝、葉芸芸：《愛憎二·二八：神話與史實》（台北：遠流，1993年），頁122-127。

在政治上又遭到差別待遇，台灣光復後，有些知識份子認為日本殖民時代一些重要公職，由日人霸佔的政治位子，可望由台灣人來取代。但行政長官公署晉用的官員亦多為外省人，行政長官公署的九個重要處會十八位正副處長，台灣人只有一位副處長，十七位縣市長僅有四位台人，陳儀雖指稱一九四六年十月統計全省四萬四千四百多公務人員中，台籍人員有三萬八千二百多名，但實際上，擔任的職位皆是委任和雇員級無足輕重的職員，高等職務幾乎全為外省籍人士擔綱，¹⁶這與台灣人原本期望從前被日本人獨占的政治上的權位，能在光復後歸還給台灣人的希望落空。且陳儀的政府官員以優越感心態，指責台灣人不管在生活上、觀念上都受到日本教育的強勢宣傳影響，對祖國情形及世界情勢的不了解，皆是受到日本的奴化遺毒，又不諳國語，加以刻意排斥貶低台灣人，而台人在工作上的待遇亦是「同工不同酬」。這些事蹟都可從二二八事件發生後所成立的「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提出的三十二條處理大綱獲得進一步的真相，¹⁷可以得知當時國民政府排擠本省人所引發不滿情緒的強力要求修正其措施的證明。另外從白崇禧將軍的訪問中，提到二二八事件過後受主席指示來台宣撫的處理原則也可得到印證：

¹⁶ 資料引自何漢文〈台灣二二八事件見聞記〉收於陳芳明編《二二八事件學術論文集》（台北：前衛，1991年版）頁238。另據楊亮功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檢討現政措施時提到對台人的任用，全省公務員54,617人，本省人佔39,720人（72.71%），外省人13,792人（25.58%），外國人934人（1.71%）；而簡任官之214人中，外省人佔202人（94.39%），本省人僅12人（5.16%）；薦任者1,704人，外省人佔1,385人（81.28%），本省人佔319人（18.72%）；以下委任及雇員則以本省人為多，可知高級公務員本省人所佔者過少，應設法培植本省高級幹部人才，以糾正目前之畸形現象。頁227-228，

¹⁷ 在政治方面包括要求制定省自治法，為本省政治最高規範、縣市長於本年六月以前實施民選，縣市參議會同時改選、省各廳處長三分之二以上須由在本省居住十年以上者擔任之、警務處長及各縣市警察局長應由本省人擔任、一切公營事業之主管人由本省人擔任、各地方法院院長、首席檢察官全部以本省人充任等等。見賴澤涵總主筆《二二八事件研究報告》（台北：時報文化，1997年），頁68-69。

- 甲、政治制度可以修改，台灣行政長官公署可改為省政府制度，看台灣的需要，可酌量增設其他必要機構。
- 乙、縣市長可定期民選。
- 丙、縣市政府首長以選用台灣之賢能人士為原則。
- 丁、台籍與外籍公教人員，資學歷職務相同者待遇同等。
- 戊、經濟政策，縮少公營範圍，發展國民經濟。
- 己、凡不合法之組織，例如二二八事變處理委員會之類應立即取消，參加事變人員除共黨份子煽惑暴動者外，一律免就究。¹⁸

（三）白色恐怖的陰影

在二二八事件之後的鎮壓，開啟了威權主義的白色恐怖統治，帶來台灣史上最黑暗的時代，而「白色獵殺」行動，是有計劃的，一方面因美國發動的反共戰略，台灣被捲入東西冷戰體系中，另一方面國共內戰的緊張情勢被延長到台灣來，在美國消極觀望態度中，國民黨在 1949 年將殘餘勢力撤退至台灣，為了做反攻準備，先後通過「動員戡亂時期臨時條款」、「軍事戒嚴令」、「台灣地區戒嚴時期出版物管制辦法」、「懲治叛亂條例」等等嚴密的監控體系，至此政治高壓籠罩台灣的天空，箝制知識份子的思想。

本土的政治菁英不可避免受到新政權的整肅，例如台灣省參議會的三十個參議員中，有六位被殺。而台北市參議會的二十六位參議員中，有十九位被新政權列為反抗行動的「主動及附從者」。這十九位參議員中有四位被殺，七位遭監禁。被新政權列為參與反抗行動的議員，總共約佔全台北市參議會的半數。當時台灣最高民意機關的省參議會，議員總共有三十名，根據鄭梓的計算，因反抗事件而被殺、被捕、及通緝的省參議員，也有十一名之多。¹⁹在經歷恐怖的屠殺與逮捕之後，本土菁英表現出對政權的疏離與政治的冷漠，不僅在最高

¹⁸ 同注 13，頁 558-559。

¹⁹ 吳乃德、陳明通〈政權轉移和菁英流動：台灣地方政治菁英的歷史形成〉，收錄於張炎憲等編《台灣史論文精選（下）》（台北：玉山社，1997年），頁 375。

層級的省參議會，基層的縣市參議員，據資料顯示有八成從政治領域中消失了，²⁰從此「台灣進入一段很長很長的政治冬天」。²¹

其次，國民政府對知識份子所進行整肅的「綏靖工作」，封閉報社事件中遭到殺害的有王添燈（人民導報社長）、林茂生（民報社長、台大文學院長）、林宗賢（中外日報社幹部）、吳金煉（新生報日文版總編輯）、宋斐如（接替王添燈為人民導報社長）、陳澄波（畫家）、陳炘（台灣金融界先驅）；被補的楊逵、張文環、吳新榮、黃師樵（新竹縣圖書館長）、莊垂勝（台中市圖書館長）、蔡鐵城（和平日報記者）；遭通緝而逃離台灣者：江文也、陳文彬、蘇新……。²²對知識份子而言是直接而重大的創傷，倖存者也在心靈上留下難以抹滅的恐懼。葉石濤在回憶錄裡記下這麼一段話：

這種恐怖感統治了所有日常生活，以達到食不知味、睡不知覺的地步。有時候，我也忽然產生某種念頭：既然談得來的所有知心好友琅鐺入獄，唯有我一個人孤苦伶仃地活在這恐怖黑暗的社會，到不如坐牢算了

23

怎樣的絕望與萬念俱灰才會想到不如坐牢？張文環對其日本友人池田敏雄道出他的心境：

台灣人背負著陰影生存下來，而且活得像笑話，然後，默默死去。有人被槍殺；而活下來的人，有的亡命他鄉。²⁴

²⁰ 同上注，頁 375~377。

²¹ 黃富三〈「二二八事件處理委員會」與二二八事件〉，收於賴澤涵主編：《台灣光復初期歷史》（台北：中央研究院中山人文社會科學研究所，1993年），頁 159。

²² 彭瑞金：《台灣新文學運動 40 年》（高雄：春暉，1998年），頁 47。

²³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十年》（台北：前衛，1991年），頁 54。

²⁴ 黃英哲編，涂翠花譯《台灣文學研究在日本》（台北：前衛，1994年），頁 27。

白色恐怖的陰影斷喪了許多的生命，拆散了無數的家庭，砍斷了眾多的愛國理想種子，政府的一手遮天，欺瞞多少原該屬於台灣歷史的真相，至今仍爭論不休的中國人與台灣人的歸屬，隱藏的其實就是這一段蓄意的鎮壓，讓看不清楚的或不能碰觸的議題，激情的上演。但是當我們回頭去看，那些為台灣奮鬥的前輩所遭受的苦難，除了怵目驚心，還有一股難以下嚥的惆悵與他們共鳴著。

二、經濟面考察

（一）戰後經濟實況

國民政府遷台之初，台灣的經濟環境早已因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破壞，工農生產降至谷底，加上國共內戰的延長，調度巨額軍費注入中國本土內戰使用，為應付龐大軍事財政，增加貨幣發行為手段來補充不足。公營企業又帶頭漲價，加速了通貨膨脹的惡化。²⁵

其次人口數量的激增，使民生物質需求壓力加大，據估計一八九五年台灣人口數約為三 萬人，一九四五年人口數為六 萬人，一九五 年加上國民黨撤軍人口數增為七五五萬人，到一九六 年更是增加至一 八 萬人，自一九四五年至一九六 年，十五年間的成長相當驚人。²⁶因此到了一九四九年物價的波動幾近崩潰，半年內物價暴升數倍。農民階層貧困化日益嚴重，農村治安狀況開始惡化，經歷過過渡時期通貨膨脹造成的經濟混亂，社會各階層貧困化，二二八事件加深本省人與外省人的對立，本地地主階層與國民政府反目成仇，以及具決定性重要因素的中國解放勢力的攻勢等，台灣的政治、社會、經濟皆陷入不安的危機漩渦當中，遂不得不實施土地改革，自一九四九年至五三年期間先後實施「三七五減租」、「工地放領」及「耕者有其田」等階段，以緩和與農民之間的緊張對立關係。²⁷

而美國又在此時（一九四九年）發表「中美關係白皮書」，宣告放棄國民政

²⁵ 見劉進慶：《台灣戰後經濟分析》（台北：人間，1995年），頁30-39。

²⁶ 見《人口政策資料彙集》（台北：內政部人口政策委員會，1998年），頁39。

²⁷ 同注25，頁71-73。

府，以示好中共，可以繼續取得在中國的利益，宣佈承認中國對台灣的宗主權，不再對台提供軍援，頓時國民政府連在台灣的統治政權也失去了合理性。恰巧一九五一年六月爆發的韓戰，扭轉了國民政府的垂危命運。美國在地緣政治考量下，台灣成為重要的戰略據點，隨即改變對華政策，且迅速介入台灣問題，派遣第七艦隊巡航協防台灣海峽，臺灣自此納編入美國圍堵共產體制的一環。此舉一方面迫使臺灣放棄反攻的企圖，一方面亦使中共行動受阻，正式干預了中國內政。隨著形勢緊張升高，美國總統杜魯門通過「共同安全法案」，重新對台灣的國民政府提供大量的援助，自一九五一年到一九六五年，持續十五年的美援，共提供了台灣的實際援助金額為十四億四千三百三十萬美元，平均每年約達一億美元，相當於台灣國民所得的五%至之十%。

（二）美援的作用

美援援助系統可分為防衛支援「一般經濟援助」，基於農產物輸出援助法的「公法四八 剩餘農產物援助」，以及基於國際開發法的「開發援助」三類，其中軍事方面的援助佔一半以上。美國並對援助效果設立一種監控制度，成立「美援台幣基金」，它是有別前者的「原始美援」的一種「衍生美援」，²⁸它需在美國監督下運用這筆資金於各項建設。美援的功能，對戰後台灣經濟的窘況具有輸血效果，但在十五年的美援階段性過程中，隨著援助內容的變化，由最初的軍事援助，轉變為經濟的介入，大部分投入公業部門，不難看出美國對台灣制約的用心痕跡，美援的目標，是要在臺灣培育美國的獨占資本的買辦資本。從機構上來看，美援的主體雖是美國政府，在本質上卻是披上「援助」外衣的美國獨占資本。²⁹

五十年代初期，政府經濟政策除了土地改革，大力發展農業，以農業培植工業，並決定採取進口替代工業的第一期四年經建計劃，提高工業的發展水平。

²⁸ 「原始美援」即指最初的美援計劃所接受的三類援助；「衍生美援」指原始美援在台灣當地轉化為台幣，以貨幣型態運用的美援而言。同注 25，頁 361。

²⁹ 同注 25，頁 363。

到五十年代末期，島內市場已呈飽和，導致生產過剩，工業成長減緩，遂改採初口擴張政策，實施獎勵投資的一連串措施，使得台灣經濟在五十年代漸站穩腳跟，為六十年代經濟起飛墊下基礎。

一九五一年起美援的挹注，解放了瀕臨破產邊緣的台灣經濟，但有一個事實不容忽視的便是「美援」對台灣經濟的干預，造就了台灣經濟的依賴性，正如陳福敏認為，美國對台灣的軍經援助是美國為追求政治霸權和經濟利益而運用的兩種方式，軍援是政治的，它有擴張美國勢力範圍作用，同時又符合美國壟斷資產階級利益，美國利用經濟手段以獲取大量的利潤，亦即經援結果使美國方便其剩餘商品的輸出，賺取高額利潤。³⁰因此，原只是為戰略服務需要，把臺灣納入戰略防線當中，但基於經濟利益考量下，認為臺灣本身的「資本主義化」，才是最符合美國政經兩方面的政策，所以美援結果使台灣經濟對美國產生相當大的依附作用。

或可說五十年代美援在台灣經濟中所播下的美國獨占資本的種子，透過兩個途徑：一方面支援國民黨軍事政權及作為其「物質手段」的公業；另一方面協助臺灣私業的發展，經由買辦的官商資本之手培育茁壯，在六十年代中期發展成熟，³¹使台灣經濟具有壟斷性及買辦性的官僚資本質性，所以美援之影響是雙重的，一是發達了台灣經濟，使台灣社會達到相當穩定；其次它又促使台灣經濟無法獨立自主，政治性格帶有買辦色彩。³²

（三）社會轉型的影響

經濟的發展對社會結構的轉變提供了基礎，最重要的鉅變來自土地改革，農村的土地階級封建體系瓦解，自耕農取代佃農，成為農業社會最主要的成員，

³⁰ 陳福敏〈美國對台灣的援助以及它的作用和影響〉，《臺灣研究文集》（北京：中國社會科學院台灣研究所，1988年），頁109-118。

³¹ 同注25，頁363。

³² 胡衍南〈戰後臺灣文學史上第一次衡的移植〉，《臺灣文學觀察雜誌》1992年9月第六期，頁30。

地主離開農村進入城市，成為資產階級。約有八萬一千戶地主的土地，由政府以公營事業公司股票和債券，收買轉賣給農民。這些地主遂由土地資本轉化為工商資本，在六十年代以後，工業蓬勃發展，迅速走向資本主義工業化，鄉村小農階級的式微，都市階級的成長，產業結構發生變化，社會及階級結構也改變，大批農民湧入城市，勞工成為最大多數，中產階級在城市中壯大，私人企業增多，整個社會便由農業轉向工業。據估計六十年代，每年大約有十萬人流入城市，五十年代初期，工人人數約在一百萬人；六十年代以後，現代工業的逐漸建立，至六十年代中期，工人人數增至二百萬人。

因為土地改革結果，加上美國協防台灣後的美日經濟，促使台灣由農業社會向現代工商社會轉型，造成台灣社會都市化的急劇提高，依據統計資料顯示，五萬人以上的市鎮，在五十年代只有九個，到六年代初已增為三四個，七年代初達六七個，³³這種集中在少數市鎮的人口，來自農村人口的大量流入，打破了傳統農業社會的以家族為本位的結構模式，轉向對物質文明的依附關係。雖然在資本主義經濟中，經由自由競爭，比較容易張揚與肯定個人自我價值，但都市文化的緊張，對精神的壓迫，更易出現焦急孤絕的心態。

當台灣社會由農業發展到工業社會，以城市為核心的現代工商社會，必然造成對世代依存的農村社會的衝擊，這種大量身份的轉換，及多數人集中城鎮，迫使農村的破敗的一種社會型態變化。而城市中的知識分子，就像一群遊牧民族般，提著公事包，遷徙在都會之間，追逐不斷創新的報酬。浮華的世界充斥著高度變化的、短暫的、流行的商業資訊，人們在設計的制度下接受新的生活方式的洗禮；生活於城市中的大眾，都是純粹的個體，反映的人際關係是鬆動又疏離的，個人圍居在自我的藩籬中，感情是有條件交換的，而價值觀的改變，帶來對角色的認同發生混淆，正如二年代美國所謂「失落的一代」的作家，

³³ 五十年代資料見陳正祥：《台灣的人口》（台北：南天，1997年），頁91-99。六十年代資料見蔡勇美，章英華：《台灣的都市社會》（台北：巨流，1997年），頁91。七十年代資料見蔡青龍〈台灣地區都市人口之成長與分佈〉，收於陳昭南等編：《社會科學整合論文集》（台北：中央研究院三民研究所，1982年），頁201-242。

對城市的墮落與空虛所造成的冷漠，有的是疲憊的身心與彷彿生活於樊籠中的壓迫感，而急欲在現實中尋找一座失落的理想的純淨城市一樣，說明都市化的代價是慘痛的。

台灣以農為主的人們離開世代生長的土地，浮沉在都市的底層，吵雜、擁擠、混亂的都市狹窄空間，城市令人墮落，泯滅了良知與感性；與傳統農村寧靜、協調、腳步緩慢、反璞歸真的自然環境相去甚遠。心靈上產生的失落感與焦躁不安，又企圖從肉體感官上追求刺激或安慰，於是掉進傳統與現代的兩難困境當中。一方是無法擺脫都市文明物質的誘惑，一方是對鄉土深深的眷戀與不捨。我們從作家筆下所反映的傳統鄉土社會在與現代文明工業社會的接觸，可以清楚看到節節敗退的農村，感受到資本主義工商業對傳統及個人的侵犯與宰制。

六十年代台灣社會在傳統與現代的衝擊困局，所導致個人在價值標準的選用時產生與社會的對立或不符合社會要求的解組現象，正如社會學家柯尼格博士解釋：

文明社會，特別是我們自己的社會，對個人的要求，不僅是過份的，而且是非常複雜的，對的和矛盾的。家、教會和學校所教導、所嘉許者，與外界的實際需要，其間常有很大的距離，文化背景不同和道德標準不同的團體，創造不同的是非觀念。……最後是文化迅速變遷產生各種新觀念和樹立各種新標準，而舊的觀念和標準卻依然存在。這一切使得許多人徬徨無主……³⁴。

正因為社會在時代脈動中毫無招架之力，而不停的轉變，生活其中的個人，也須同時跟上步伐，但人性中的理智與感性，往往又困惑於社會大規模的改變所造成的存在意義迷思，這也就是社會學家布洛（Bloch）在其巨著《個人解組與社會解組》中認為個人解組情況下的個人會採取五種態度：

³⁴ 柯尼格著，朱岑樓譯：《社會學》（台北：協志，1962年），頁58。

- (一) 回復到原有的行為規範。
- (二) 創造自己的行為方式，設法為社會所採納。
- (三) 用各種反社會行為，如非法和犯罪，以攻擊現存的社會秩序。
- (四) 退出社會，隱匿避難。(各種精神病即內心的退卻)
- (五) 以自殺解脫一切。³⁵

此即六十年代出現大量描寫死亡或發瘋的情節原因，小說主人公的隱遁或以自殺追求超越與自我控制、以死亡嘲弄人生的荒謬等等，都是社會轉型下產生的各種面向。

光復後的台灣，迎接已接近神格化的「祖國」，然而在短短一年四個月之後，如大夢初醒，意識到祖國最落後的一面。對國民政府而言，撤退台灣是暫時的，最重要的工程，在以台灣為根據地，收復在大陸失去的政權。然而所依恃的反攻力量，不管是政治還是經濟，均仰賴美國鼻息。隨著美軍援駐台，資金、技術、文化和意識型態，隨美國援外單位、美國文化中心、美國新聞處等輸入第三世界。³⁶迫於現實上對美國政治經濟的依從關係，陳映真就指出美援使台灣的政經文化淪為「對西方的附庸化」，³⁷在意識型態上呈現複雜的所謂「美國情結」。³⁸整個政經導向以西方為鵠的的崇洋風氣中，美式的價值標準取代了中國傳統的觀念，親美路線的現代主義，便水到渠成的進入台灣文壇。

³⁵ 同上注，頁 59。

³⁶ 江寶釵《論《現代文學》女性小說家 - 從一個女性經驗的觀點出發》，1994 年師大國文所博士論文，頁 43。

³⁷ 陳映真〈文學來自社會反應社會〉，收於陳映真《孤兒的歷史 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1994 年），頁 8。

³⁸ 陳映真〈美國統治下的台灣〉，收於《陳映真作品集 13》（台北：人間，1988 年）頁 18-21。

第二節 作家處境

知識份子處於動盪的社會，生命的不確定性時時籠罩人心，由於政治因素的影響，文學傳統的橫遭切割，語言轉換造成書寫工具無用武之地，官方文藝政策的僵化及框式表現手法，掐住了他們渴望自由空氣的靈魂。

一、文化斷裂

(一) 五四傳統的斷裂

繼二二八事件而來的是五十年代的整肅，管制思想言論，圍堵不同聲音與言論。文化層面影響而言，一九四九年四月六日的「四六」事件，台大、師範學院（現台灣師範大學）學生，約二百人被捕；楊逵因發表「和平宣言」繫獄十二年；創辦《自由中國》雜誌的雷震被逮捕；呂赫若逃往山區遭毒蛇咬傷身亡（呂赫若的下落成謎，另有說詞或說是逃往國外等）；朱點人、簡國賢遭到槍決等等，據統計，從一九四九年到五二年，被當局以匪諜共黨人員名義槍斃者達四千人左右，而被問罪判處徒刑，無期徒刑者約八千人到一萬人，至於被秘密處決者，則無從統計。³⁹凡此種種，導致文化人噤若寒蟬。白色恐怖造成

³⁹ 見陳孔立《台灣歷史綱要》，頁443。二二八事件中遭殺害數人數有不同的數據，依據楊亮功、何漢文的「二二八事件調查報告」中，各縣市政府對事變中的死傷人數報告：台北市公務員死亡人數33人，受傷886人，失蹤7人，而人民僅死傷52人，調查也報告指出人民死傷者遠在統計數字以上；基隆市256人，新竹市44人，台中市106人，彰化市7人，嘉義市277人（戰鬥死傷的暴民不計），台南市48人，高雄市410人，屏東市33人，台北縣5人，新竹縣人（無詳確報告），台中縣26人，台南縣68人，高雄縣11人，花蓮縣4人，台東縣19人，約計2272人。見注16，頁204-212。以下引自同注，僅標頁碼，另何漢文在〈台灣二二事件見聞記〉提到陳儀對他說：「此次事變死亡的共計三千人左右，四百多人統計數字本是軍警，八百多人是公職人員外，本地人民死亡約一千八百人」，何漢文質疑這項本地人的死亡數字，其推估台灣人在事變中死亡的最少七八千人，連同受傷人數估計再醫萬人以上。（頁259-260）美國觀察家及學者對台灣人因「二二八」而犧牲的人數都不敢確定，包括卡兒氏、鮑大可、孟

「人性的被扭曲、互不信任的人際關係和陽奉陰違的社會風氣，很快蔓延到台灣整個社會」⁴⁰。

又因國民政府在大陸的慘敗，於遷台初期，鑒於中國大陸的陷共，檢討其原因，認為是三十年代左翼作家聯盟所鼓吹的左翼文學，對知識分子造成的影響，為了鞏固在台灣的統治，杜絕一切偏「左」的思想乃是刻不容緩的工作，於是下令，凡附匪以及留在淪陷區的學者、文人的著作一概禁絕，此種禁令等於宣告「中國現代史上百分之九十九點九的有價值的文學與學術作品一概免讀」⁴¹，舉凡老舍、魯迅、沉從文、茅盾、曹禺等重要作家與台灣文學界絕緣，五四傳統在台灣無異被宣告死亡。

斬斷五四文化對台灣作家的影響，羅青說：「在大陸上受過不完全教育的流亡學生或軍中的文藝青年，來台時的年齡大約在十幾歲到二十幾歲左右；他們與台灣本土上相當年齡的學生或文藝青年匯聚成「過渡時代」的主流。他們對五四運動以後的新文學，多略有所聞，但能以史的觀點去透徹了解五四精神，從而真心佩服繼承的人卻十分稀少。」⁴²說明大陸來台作家與文學傳統中斷的尷尬局面。

遷台第一代作家內心充滿思鄉情懷，為回憶所束縛而無法行動起來，新一代作家皆屬來台第二代，在台灣完成教育的子弟，這些新一代的作家沒有機會接觸到較早時代的作品，因為魯迅、茅盾及其他左翼作家的作品全遭封禁，他們未能承受上一代的文學遺產，找不到可以比擬、模仿、競爭的對象，因此，寫作生涯變成了困苦又孤獨的奮鬥。⁴³夏濟安教授在為文慶賀《現代文學》創刊祝辭中，提到五四文學的重要：「你們要創辦自己的文學刊物，可是你們看不

德爾、邁之那等均認為，包刮被處決的人士，「二二八」犧牲的人士，至少一萬而且大半是台灣菁英。（頁 93-94）

⁴⁰ 戴國輝：《台灣總體相》（台北：遠流，1989年），頁 129。

⁴¹ 呂正惠：《戰後臺灣文學經驗》（台北：新地文學，1992年），頁 10

⁴² 轉引自呂正惠：《戰後臺灣文學經驗》頁 39。羅青〈理論與態度〉一文。

⁴³ 白先勇：《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年），頁 110-111。

到過去的那些書，我認為總是吃虧。」⁴⁴「五四」是他們的文學之根，所以「他們既不能承繼三十年代、四十年代的大陸文學，又無法跟這塊新土地結合，只好大量吸收歐美現代潮流，在這外來的文學的基礎中建立他們的文學王國，他們正是於梨華曾說的『沒有根的一代』。」⁴⁵來台作家的文學傳統硬生生的被展斷了延續的可能。

（二）本土文學的斷裂

台灣新文學運動自一九二一年發軔，其反抗日本帝國主義外，同時也是民族的意識覺醒運動，反封建，反傳統迂腐落後體制的批判精神，與中國五四運動有極大相似性，但也因從事新文學運動的大將楊逵、呂赫若等皆具左翼色彩，對國民政府而言具有潛在的威脅。而且台灣在歷經日本殖民五十年期間，所從事的新文學運動，一直處於外來政權殖民壓迫的惡劣環境下，但仍開出豐碩的果實，自新文學運動之父賴和以降，王詩琅、吳松谷、楊逵等等都曾先後身繫囹圄，反抗的運動精神已形成臺灣新文學的重要性格，亦即為維護臺灣本土文學的廣續，是置生命於度外的自主意識展現。

彭瑞金就說：「日據時代的臺灣新文學運動史，根本就是一部反抗運動史。」⁴⁶因此對國民政府而言乃觸犯了它的忌諱，憑藉國民政府？對的軍事力量，打擊本土力量，台灣文化界人士或被殺，或被監禁，或逃往大陸各地，或沉默的度過餘生，呂正惠曾結論過台灣傳統文學的斷裂：「面對台灣獨特的歷史發展（至少有別於中國大陸），台灣也曾有輝煌的本土文化運動，它既是台灣人民特殊的歷史命運中發展出來，但也跟中國本土命運有著藕斷絲連的關係，但是，等到國民黨來統治台灣，這樣一個歷史傳統卻幾乎被連根拔除了，其徹底的程度，比起國民黨之斬斷大陸的五四傳統，實在是只有過之而無不及」⁴⁷這是台灣文

⁴⁴ 見《聯合文學》，1992年5月，第八卷7期，頁51。

⁴⁵ 同注3，頁114。

⁴⁶ 同注22，頁30。

⁴⁷ 同注41，頁13。

學的悲情，葉石濤沉痛的回憶：

光復的來臨給台灣人帶來當家作主的機會，可惜，自由、民主的憧憬像曇花一現似的掠空而去，從二二八到五〇年代的白色恐怖，日據時代的噩夢再度出現，台灣又復淪為豺狼？行、魑魅魍魎跋扈的黑暗世界。台灣的知識份子和作家奮力抵抗，想維持台灣新文學的傳統香火於不墜，但這些抗議和控訴在巨大的統治力量下逐漸崩潰。台灣作家同殖民地時代一樣，被囚禁、被放逐、被處決。終於被迫沉默，大地一片寂靜和漆黑。在這樣的法西斯統治下，文學只是執法者統治下的工具。作家必須依附權力機構才能苟延殘喘，同執政者的既得利益背道而馳的一切文學活動或歧異思想是執政者用盡手段要予以撲滅的對象。...老一輩的台灣作家...只好忍氣吞聲放棄了文學。⁴⁸

作家的暗啞，文學蒙上陰影，過去三十年的台灣新文學命脈，就此被切斷。

二、官方文藝政策

對於文學的斷裂真空狀態，當政者也明白必須填以某種思想，同時為了配合「一年準備，二年反攻，三年掃蕩，五年成功」的反攻復國號召，積極推動所謂「反共文學」⁴⁹正式將文學列入反共戰鬥文藝的一支，由官方創辦文藝團體，企圖控制整個文藝思潮，配合國策的推行。就連引進現代詩的關鍵人物紀弦，開展新路線而於1956年創刊《現代詩》，擎起現代派的旗幟，強調現代化的新詩主張，仍在其創刊的第六信條 - 愛國反共，追求自由與民主，留下與官方文藝政策相呼應的痕跡。

一九五〇年四月「中華文藝獎金委員會成立」，同年五月由張道藩主持的「中國文藝協會」成立，推動反共抗俄文學，在成立宗旨：「除團結全國文藝界人士，

⁴⁸ 葉石濤《台灣文學的悲情》（高雄：派色，1990年）頁15。

⁴⁹ 孫陵主編《民族晚報》副刊，在1949年11月的創刊號，提出「反共文學」一詞。

研究文藝理論，從事文藝創作，展開文藝活動，發展文藝事業外，更以促進三民主義文化建設，完成反共抗俄復國建國任務為宗旨」可得知中國文藝協會，幾乎網羅了台灣地區較有名望的文學工作者，壟斷台灣文藝的活動，一九五三年八月成立「中國青年寫作協會」，一九五五年五月成立「台灣省婦女寫作協會」，這些文藝團體的出現，一方面滿足作家發表作品園地，最重要的是加強全民性的反共意識，落實「戰鬥性第一，趣味性第二」的反共抗俄文藝政策，繼而霸佔了整個台灣文學發展空間。

葉石濤批評這些大陸作家，在大陸淪陷後轉到台灣，心靈充滿著沮喪和仇恨，反映這種心境在文學上自是憤怒和仇恨，所開出的文學花朵是白色而荒涼的，缺乏批判性和人道主義關懷，使文學成為政策的附庸，導致反共文學變成令人生厭的、劃一思想的、口號的八股文學，⁵⁰白先勇也提到：

遷台作家的心理問題----那時他們驚魂甫定，一時尚未能從大陸所受的沉痛打擊中清醒過來，另一方面卻沒有足夠的眼光與膽量，來細看清楚錯綜複雜的新形勢，所以只好盲目接受政府所宣傳的反攻神話，他們更無勇氣承認這種流放是永久的。結果這些作者筆下的人物大多與現實脫節，布局情節老套公式化，故事的主人翁不管如何飽嘗流放的苦痛，總是會重臨故土，與大陸上的家人團圓結局。這些作品滿注思鄉情懷，但這種悲傷的感受老是陳腐俗套，了無新意。⁵¹

由於大陸來台第一代知識分子是在倉皇中渡台，大陸與台灣的分隔，演變成斷絕往來的局面，是對台灣本無久留之意的大陸作家始料未及的，他們不認識這塊土地的歷史和人民，也沒有具體的情感與文化歸屬認同感，魂縈夢繫的是那繁華、適意的家園國土，有的是鄉愁，鄉思形成的具有鮮明時代特徵的文化鄉

⁵⁰ 同注 3，頁 88。

⁵¹ 同注 43，頁 108-109。

愁作品，⁵²遂與生活其上的台灣現實民眾脫節，對台灣民眾而言，那卻是有如別的國度中發生的風花雪月，怎麼也無法體會、融入，尉天驄就曾說：

由於當時台灣經歷島內之動亂未久，惶恐無著的人們很難與所謂的「反共大業」結合在一起。也就是說，就廣大的台灣同胞而言，反共文學一開始便因為與此地的文學傳統切斷關係而缺少生根的土壤。⁵³

「反共抗俄文藝」政策，剝奪台灣作家寫作的權利與表達思想的自由，這股伏流的湧現在六十年代的小說便分為兩個方向及階段前進，一是探討個人存在問題的現代主義文學風格的小說；一是以台灣風土人物的寫實生活為主的鄉土色彩小說，共同呈現六十年代的文學風貌。

三、語言轉換問題

在台灣作家的文學斷裂中還有一個重要問題，那就是「語言」。作為寫作工具的語言，在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五日禁用日語的政策實施，行政長官公署正式宣佈廢除報紙的日文欄，台灣作家究竟是否受其影響，有不同的看法。尉天驄以為：「...很多人多拿語言的阻隔（要重新學習國語國文）作為主要的原因，其實並非如此，如吳濁流等人，已能用中文寫作...」⁵⁴又如日據時代活躍的作家呂赫若，在光復後，於很短時間即以中文創作；呂正惠在〈陳芳明「再殖民論」質疑〉文中提到，台灣新文學傳統「斷？」主要原因不在於老作家「停

⁵² 王宗法先生歸納大陸籍作家表現的文化鄉愁主題作品：一具有執著的意向，即潛存著統一國的意向。二內涵具有泣血之聲、委婉之曲、沉潛之流、變調之韻等情態。見：王宗法〈當代台灣文學的文化主題〉收入於《台灣香港澳門暨海外華文文學論文選》（福建：海峽文藝出版，1993年），頁150。

⁵³ 尉天驄〈三十年來台灣社會的轉變與文學的發展〉，收於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主編《台灣地區社會變遷與文化發展》（台北：中國論壇編輯委員會，1985年），頁450。

⁵⁴ 同注53，頁455。

筆」，而在於不敢講、不敢讀，思想箝制，就像國民黨對付二、三十年代文藝一般。把這一切主要歸罪於語言政策是蓄意誇大。⁵⁵曾健民亦認為：「台灣話和白話相近本是同系語言，是民族語言，不是外語，要克服並不困難……本地作家變作無言的一代，並不是語言政策造成的，而是時代的多難所造成的。」⁵⁶但多數作家認為文學表現工具的喪失，使得台灣作家不得不處於邊陲地位，楊遠就認為：

光復以來快要三年了，應要重振的台灣文學卻還消沉得可憐。這原因其一是在語言上，就是十多年來不允使用被禁？的中文，今日與我們生疏起來了，以中文就很難充分表達我們的意思了。 其二是政治條件與政治變動，致使作者感著不安、威脅與恐懼，寫作空間受到限制。⁵⁷

對戰後第一代台灣小說家而言，多半是受日本制式教育，不管是生活用語、思考模式，習以日文為主，漢文對他們來說是完全陌生的語言，因此語言的跨越是痛楚的，中文書寫向被視為最流暢的鍾理和也說到：

我在文字上尚欠錘鍊功夫是真的，這原因，我自知：一國學根基太淺，或者竟談不上有根基；二受日文影響太深；三我初學寫作時既無名師指點，祇憑有限的作文能力，先用日文把文章故事打好腹稿然後用中文寫出，積久成習，以後就很難擺脫它的影響。⁵⁸

其他作家如張文環提到他的痛苦：「台灣的光復在民族感情熾烈的他自是有生以來最大的一件快心事，然而他的作家生涯卻從此擱淺了。一向用日文寫慣了作

⁵⁵ 見《聯合文學》，2001年12月，第十八卷2期，頁144。

⁵⁶ <「戰後再殖民論」的癱倒>，《聯合文學》第十七卷3期，2001年1月，頁134。

⁵⁷ 張金墻：《斷裂與再生 - 《台灣文藝研究》》（台南：台南市立文化中心，1999年），頁53。

⁵⁸ 鍾理和：《鍾理和書簡》（台北：遠行，1980年），頁34。

品的他，驀然如斷臂將軍，英雄無用之地，不得不將創作之筆束之高閣。光復以來雖認真學習國文，但是一枝創作之筆的煉成談何容易？」張冬芳回憶國語政策使當時台灣作都變成「文盲」，⁵⁹王詩琅更指出台灣作家沉默的內在原因：

表現工具上，過去以中文寫作的因多年輟筆，有的不敢輕易動筆。而以日文寫作的既無日文作品發表機關，又限於中文寫作能力不夠，新的工作者非急速可以培養出來。⁶⁰

葉石濤為了克服講與寫白話文的困難，其艱辛的學習過程：

我找到的辦法也許最笨，但最有效。我買了一本紅樓夢，把那一百二十回的厚書，從頭到尾抄了一遍，碰到不懂的字我就查字典，瞭解它的字義和發音，再搞不通，我就把松枝茂夫...翻譯為日本譯本的岩波文庫本找來細細的對照，終於似懂非懂地搞清楚了白話文的書寫技巧和它的結構。⁶¹

詩人巫永福在紀念《台灣文藝》一百期的文章提到：

雖然戰爭結束時有短暫的心神安寧，歡喜臺灣光復的時刻；卻遭隨之而來的臺灣政情動蕩不穩，加上因語文的變化所造成的困擾致有前人徬徨，後人不繼的現象。⁶²

以上多位作家的語言轉換痛苦過程，都足以說明語言的轉換，在某種程度上斷

⁵⁹ 陳芳明〈戰後初期文學的重建與頓挫〉，《聯合文學》2001年3月，第十七卷5期，頁155，

⁶⁰ 陳芳明〈五十年代的文學侷限與突破〉，《聯合文學》2001年6月，第十七卷8期，頁165，

⁶¹ 彭瑞金：《葉石濤評傳》（高雄：春暉，1999年），頁122。

⁶² 《臺灣文藝》一二期，1986年11-12月，頁18。

喪了作家的利器。陳芳明也認為台灣文學風格之一，便是語言的隔閡與斷層，台灣作家放棄已純熟的日文，接受新的語言，中文思考模式，絕非一蹴可及，對當時肅殺凝重的政治生態，檢查監控嚴密的思想警察，作家要使用不熟悉中文以避開，勢必無法以成熟技巧來迂迴表達內心的苦悶與不滿情緒，正如呂正惠不贊同語言是文學斷裂的主因，但其亦不否認「會用中文創作」跟「能把中文寫得精妙」是兩回事。⁶³因此戰後二十年僅有少數台灣作家，如鍾理和、李榮春、洪貴秋，才能繼續創作，大多數的台灣作家，如廖清秀、鍾肇政、文心、鄭煥、林鍾隆，陳火泉，都從勺々口口開始學習中文，⁶⁴否則亦從此淪為無聲的一群。這些台灣文學先鋒，不得不黯然消逝於文壇。

第三節 作家思想

作者創作時必然會受到社會背景、時代潮流以及個人成長經歷影響，六十年代不管是大陸來台人士或本土成長的作家，接受相同的教育與西方思潮洗禮，但各自的原鄉不同，成長的歷程互異，加上政治因素造成認同危機，都使創作者呈現多元、獨特風貌作品，以闡述知識份子滿腔的理想與衝突。

一、西方思潮衝擊

政治的一言堂、社會結構的瓦解、傳統文化的斷裂，是六十年代台灣現代主義足以發展的背景條件，那是一個「新」、「舊」撞擊，認同產生危機的年代，尋找生命出口急切而徬徨的年代，正如施淑稱六十年代的台灣是個歇斯底里的時代：

⁶³ 呂正惠〈葉石濤和戰後台灣文學的「斷層」與「跨越」〉收於鄭炯明編《點亮台灣文學的火炬》（台北：春暉，1999年），頁105。

⁶⁴ 戰後第一代作家的語言轉換情形：鍾肇政在五一年發表第一篇中文創作；廖清秀五二年；鄭煥五六年；林鍾隆四九年；文心五二年；張彥勳五八年。見上注，頁103-104。

以文學從事者為例，在戒嚴令下，他們被斷絕了日據時代台灣文化和中國大陸的五四傳統，他們能做的是接受或拒絕以正統自居，以國仇家恨為前提，而事實上是法西斯的所謂和賊不兩立的思考。在這種情形下，以學院為中心的部分文學青年，只有在這歇斯底里的思想圍城裡，成了窺視者：從被禁絕不了的魯迅等少數作家的斷簡殘篇，窺視文學史。從耳語、小道消息，從被塗去、被撕裂，以至於整頁消失的時代周刊、新聞周刊，窺測台灣現狀、鐵幕後的蘇聯、中國文化大革命、東京巴黎美國的學生運動、種族屠殺、布拉格之春等等世界大事。在這之外，以最奇怪的方式，從進出基隆台北高雄酒吧的美軍，看越戰正在進行。……這白色恐怖的窺視文化，戒嚴令延長的戰爭狀態，窺視者緊張、痙攣、破裂的心理，提供六十年代台灣現代主義發生的內外條件，當時的文學青年會在還來不及認識現代及現代性的基礎上，沒有異議地接受作為他的反命題的存在主義、心理分析，會義無反顧地以困境、疏離（異化）、荒謬、沒有原因的反叛等等套語和模式思考、行動、創作，都是這歇斯底里的處境的條件反應。⁶⁵

回顧台灣文學上對現代主義的吸納，早在五十年代就從現代詩發端，紀弦創辦的《現代詩》即聲稱是「包容了自波特萊爾以降的一切新興詩派之精神與要素的現代派之一群」，並提出「橫的移植，而非縱的繼承」主張。而現代詩所表現的西方思潮也受到諸多的尖銳批評，但也顯示朝向自我批判的自省活動。一九五六年夏濟安先生主編的《文學雜誌》，更是譯介西方文學作品及文學理論，試圖打開了五十年代封閉而索然的戰鬥反共文學風氣，且成為六十年代西方思潮移植之前導，其最重要是影響了白先勇在六十年代創刊《現代文學》雜誌。

《現代文學》有系統且大量的譯介西方現代文學思潮，包括的現代主義作家及作品有卡夫卡、湯瑪斯 吳爾夫、勞倫斯、喬艾斯、福克納、卡繆、沙特、

⁶⁵ 施淑〈現代的鄉土 - 六、七十年代台灣文學〉，收於楊澤主編：《從四十年代到九十年代 - 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頁255。

維吉妮亞 吳爾芙、葉慈、艾略特、亨利 詹姆斯、海明威、佛洛伊德、等等，可說是擴大了文學的表現領域，注入新的創作手法，如精神分析法、意識流的運用、語言風格的創新等，提供一塊文學園地，讓一大群有才華，有理想的青年作家播種耕耘，開花結果，為台灣文學創立一種新的風格。⁶⁶從幾個重要的文學刊物《現代詩》《創世紀》《文學雜誌》《筆匯》《現代文學》《文星》等來看，都有一共同的特點，即介紹西方十九世紀以來的文學思潮，使年輕一代在被扭曲的歇斯底里中，不管是來自學院，還是流亡學生出身的社會青年，或來自軍中的作家皆在現代主義的旗幟下聚攏。

對於六十年代掀起的現代主義浪潮，前面已分析過，一方面是對於官方文藝政策的反動，即對文學政治化、庸俗化、制式化的反感，「一般作家甚至對一切直接反映現實社會的文學，都起了反感，至少是懷疑。餘下來的一條路，似乎就只有向內走，走入個人的世界，感官經驗的世界，潛意識和夢的世界。」⁶⁷其次對文學傳統斷裂的迷惘，政府當局人為的切斷臺灣文學與五四傳統的聯繫，逼使作家不是往古書中尋找寄託，便是往西方文學裡找解脫。然而「古代已經離我們很遠了，而現實的世界已經支離破碎，...我們的希望要放在哪裡呢？」⁶⁸於是造成無根與放逐感，這是大陸來台第二代作家對原鄉失落的存在處境，這個存在感即構成他們接受西方現代主義，尤其是存在主義的最佳橋樑，那是一個內心的世界，在安全的禁地裡，容許自我去肯定主觀的世界。

考察西方知識份子從社會疏離出來的背景，乃在十九世紀末，資本主義高度發達，工業革命與社會轉型的衝擊，引起人們內心的不安與焦慮。加上第一次世界大戰（1914-1918）的浩劫未久，第二次世界大戰（1939-1945）又緊接著來到，帶來大屠殺的創傷及蹂躪，期間又發生二十年代的世界經濟大蕭條，動盪的生活，頓使人類對自我生命掌握的不確定性升高，一種被上帝拋棄的無

⁶⁶ 白先勇〈《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收入於《現文因緣》（台北：現文，1991年），頁13-15。

⁶⁷ 余光中《中國現代文學大系，總序》（台北：巨人，1972年），頁3。

⁶⁸ 杜南發〈葉維廉答問客：關於現代主義〉，《中外文學》1982年5月，第十卷12期，頁48-56。

助感，而產生的宗教信仰泯滅；且在物質文明壟斷下的孤絕與單調生活，逐漸意識到自己淪為「機械的一部份，人們的焦慮與苦悶來自明天的生產數字或上班時間的壓力。」⁶⁹人被物化後產生的心靈空虛，深沉的絕望與鬱悶的窒息，迫使人們與生存的環境及時代產生疏離，⁷⁰因而開始轉向內心世界的透視，思考人的存在價值問題，這是西方知識份子的疏離態度，可說來自對資本主義的反動。

而臺灣知識份子的「存在」焦慮感大部分應歸於政治現實，因為台灣當時的社會，並無類似西方現代化、工業化的社會條件，之所以會與西方現代主義產生契合，當可確定乃是當時政治環境，塑造一個恰當的空間，使現代主義能夠在台灣滋長，像七等生處理文學的方式，往往違反現實社會的一般邏輯性，他在與梁景峰的對談中即提到：「我們處在這個時代，我們有很多被壓抑的願望，如果不藉這些表現（依前文指弗洛伊德的性和夢的解說）來滿足，我們是很難活過去的。」⁷¹不能讓思想自由翱翔，處於壓抑中無非是政治因素的複雜性使然；又如楊照分析其原因亦認為是來自政治因素：

對當時的現代派作家而言，更切身、更直接的「孤絕」、「慌亂」、「波動」恐怕還是政權更替所帶來的流離失所。這些現代派作家絕大多數出身大陸，經歷了一次移民換位，來到一個曾經經歷半世紀日本殖民統治的台灣島上，度過一段栖栖遑遑如臨末日的危機時刻，因此而感受到的陌生

⁶⁹ 陳芳明〈從現代主義到後現代主義〉，《聯合報》，2000.6.27，37版。

⁷⁰ 人類的文化是，沿著三種不同的關係在演進：第一種關係是人與自然的關係；其次是人與人之間的關係；第三種是人與人自己的關係。這三種關係的成立，是基於人類一項基本的特質：人，生而疏離。因此，人與自然疏離產生宗教，人與人間的競爭和搏鬥產生人際間疏離現象，最後當「我們是誰？」問題被提出，在知識性探討中，把「我」當成對象，「我」與「自己」之間已在關係中疏離了。參見韋政通：《中國思想傳統的創造轉化》（台北：紅葉文化，2000年），頁252-256。

⁷¹ 梁景峰：《鄉土與現代 - 台灣文學的片斷》（台北：台北縣立文化中心，1995年版）頁91。

不安，在強度上當然不會遜於工業化、都市化帶來的「現代衝擊」。⁷²

若從社會心理學角度來看，孟樊也主張是政治的高壓氛圍，造成心理背景與西方現代主義崛起有異曲同工的關聯性：

在政治氣氛緊張的時代，表達意見的自由受到約束，作家在創作時心中自有「警總」，形成一些不敢碰觸的禁區。另外臺海兩岸的對峙，整日陷於「反共抗俄」的戒備狀態中，台灣的前途處於極度的「不確定」狀態中，而日據時代作家有所謂語言的表達障礙，渡海來台的作家對這塊土地又感陌生，作品現實上的反映不可能，只好轉到內在的挖掘，以「不確定的內在現實」的自由創作，對抗「外在現實」的不自由。⁷³

不確定的年代，有著明晃晃的檢查制度；⁷⁴自由的靈魂，遭到裁剪、綑綁與標籤化，但人類是有意識、有思想的，在不斷反芻與試驗過程中，試圖找到一個出口，來安置騷動不安的心靈，於是借助西方現代主義火種，來反映生存的現實社會實況。

二、認同危機

⁷² 楊照：《文學、社會與歷史想像-戰後文學史散論》（台北：聯合文學、1995年），頁116-117。

⁷³ 孟樊〈臺灣現代詩的理論與實踐〉，《創世紀》，第100期，1994年4月，頁47-59。

⁷⁴ 依據林慶彰對文學禁書的研究指出：在戒嚴時期，官方主要是以「台灣省戒嚴期間新聞紙雜誌圖書管制辦法」和「出版法」管理文學書籍的出版，違反其中款項者即遭禁絕。尤其在五十年代反共氣氛濃烈的情形下，只要是三十年代的作品，不論內容如何，只因作者淪陷大陸，統統以「為匪宣傳」加以禁絕。臺灣文學作品備查禁者多出於妨害風化、混淆視聽、影響民心士氣、危害社會治安等理由。例如郭良蕙的《心鎖》、吳濁流的《無花果》、陳映真的《將軍族》都在查禁之列，當時的文網之密，可見一般。參見林慶彰〈當代文學禁書研究〉，收入於行政院文建會編《臺灣文學出版 - 五十年來臺灣文學研討會論文集（三）》，頁193-215。

心理學上的認同是精神分析論創始人弗洛伊德理論中的術語。是指個體潛意識地向別人模仿的歷程。後來心理學家擴大其意，指個體行為社會化的歷程，在社會情境中個體向其他個人或團體的行為方式、態度觀念、價值標準等，經由模仿、內化而使其本人與他人或團體趨於一致的心理歷程，經過社會學習或社會化後，在心理上產生的一種主觀的歸屬感或歸屬意識。「認同危機」按心理社會發展論倡導者艾力克生定義，乃是個體在自我追尋中因不易獲致自我肯定而感到的焦慮。⁷⁵當個人在參與社會的組織或團體，經由時間的過去，在歷史的學習中會產生足以培養國家認同的意識，這與心理的認同理論有相似的過程。本小節分別從台灣本土與外省籍認同危機探討。

（一）台灣本土認同危機

台灣人認同意識的起源，一般學者認為是自日本統治時期開始形成與發展。包括日人矢內原忠雄曾謂：「日本帝國主義的支配進展，乃使台灣人的民族運動自趨成熟」；⁷⁶彭瑞金〈台灣民族運動與台灣民族文學〉一文中：「因日本據台表露的領土野心，而刺激台灣人去思考人與土地的關係，激發台灣人的民族意識。」又說「台灣文學如果沒有日本政權的壓迫，未必能從同化論的輾輪下擠出台灣意識來。」⁷⁷；林瑞明〈台灣文學研究與國家認同〉一文中提到：「『台灣人』的角色認同是在日本統治下形成的。」⁷⁸；張炎憲〈台灣史上的政治運動與國家認同〉也主張日本統治促成台灣認同，日本導入許多近代措施，有助台灣人的整合，台灣意識的產生，以及對台灣的認同。⁷⁹戴寶村〈歷史教育與國家認同〉分析馬關條約給台人有兩年緩衝以選擇國籍，結果到一八九七年五月八日「住民去就決定日」，台人離去者只有六、四五六人，佔當時全台人口二

⁷⁵ 以上名詞定義參見張春興：《張氏心理學辭典》，（台北：東華書局，1989年），頁316-317。

⁷⁶ 矢內原忠雄著，周憲文譯：《日本帝國主義下之台灣》（台北：帕米爾，1987年），頁174。

⁷⁷ 李鴻熙等：《國家認同學術研討會論文集》（台北：稻香，1993年版），頁73。

⁷⁸ 同注77，頁88。

⁷⁹ 同注77，頁102。

百八十萬人的 0.23 % 而已，台人由地區、社群的認同，進一步接受「本島人」的身分認同。⁸⁰

日本殖民時期對台灣人種種的壓迫，引起台灣社會運動的發展，而漸漸形成以台灣作為認同、訴求對象，但台灣人的抵抗雖是慘烈的，卻始終沒有辦法脫離日本的殖民事實，因此會如吳濁流的認同漢人的祖國一樣，熱烈歡迎祖國，但這樣的期待，正如在本章第一節提到的，經過二二八的血腥鎮壓結果，期待很快便落空了，這是本省籍作家的認同危機開端。認同的危機是美國精神分析學家艾力克生（Erik Erikson）提出的當傳統社會在轉化成現代社會的過程中，不可避免地會發生，傳統價值觀與現代價值觀的矛盾與摩擦。國民政府製造反共神話光環，扣上中華民族的正統大帽，透過教育、文化活動、傳撥媒體灌輸對中國的認同，去學習櫥窗化的中華文化，以強制手段扭曲台灣人的語言、思想、文化、歷史，使生長在台灣這土地人民，無法與台灣歷史共成長，令台灣人喪失歸屬感，彷彿又進入到沒有歷史、沒有傳統、沒有記憶的殖民地社會。

國民政府撤退來台，帶來台灣人民所陌生的「共匪」，就台灣人民而言，五十年來要反抗的是日本殖民政權，當日本戰敗，台灣光復，自大陸來台接收政權的即是「祖國」。至於國共爭霸，兩者的國恨家仇，對台灣人民是陌生的，正如同日本殖民台灣五十年，台灣人民的抵抗與被殖民的屈辱，對大陸的「祖國」是陌生的一樣。國民政府在台掀起「反共抗俄」的無名恐懼，加上二二八事件與風聲鶴唳的白色恐怖行動，使國家認同產生動搖與幻滅。台灣人民不得不在思想上、國家認同上開始尋找出路，於是產生兩種不同的政治路線：

有一部分知識青年，由於對社會主義的嚮往，以及因社會主義的信仰而移情於對中共的寄望，遂漸漸在台灣本土形成一個新的戰後左翼路線。

於此同時，另一批知識份子對國民黨政府感到失望，以及因唾棄國民黨而對整個中國充滿了不信任，也慢慢地在台灣社會裡釀造一個日益顯著

⁸⁰ 同注 77，頁 130。

的獨立運動。⁸¹

李敏勇在〈戒嚴下的風景〉中亦認為對國民黨政權產生認同的拒絕和否定，而萌生對中華人民共和國認同及對台灣獨立認同的兩種潮流。⁸²

台灣本土作家生存在這樣的環境下，除了以抗日題材來影射霸權文化與專制政權的控訴，另一方面將筆觸轉向社會底層，描寫小人物的生活百態，刻劃普遍人性，尋找台灣人的原型：質樸、單純、憨直、坦誠的傳統⁸³及性格上強烈的抵抗精神。如黃春明〈溺死一隻老貓〉的老農夫，以死抗議田地的被文明入侵、破壞；王禎和〈嫁妝一牛車〉中掙扎在貧困邊緣，為生活委曲求全與人共妻的牛車夫等等，呈現小人物韌性的農村性格。關心本土也是反抗體制的方式之一，與官方大力提倡反共大業形成反調色彩，亦可說是以冷漠對之的一種抗議行動，同時也是處於伏流中，不曾稍歇的尋找主體認同的可能。

陳映真則是從認同中國出發，但不幸產生認同失落的危機。如在〈故鄉〉中的哥哥原是滿懷人道主義，放棄高尚且賺錢的開業醫師條件，為鄉里的焦炭廠做保健醫師，卻在父親的突然病逝，清理債務失去家產後，成了放縱邪淫的惡魔。雖然作者賦予曾如太陽神般的哥哥，站在一個受苦的普羅米修斯神的高度，⁸⁴但面對挫折的哥哥，其劇烈的轉變原因，⁸⁵若以哥哥代表的是「大陸」，

⁸¹ 陳芳明：《典範的追求》（台北：聯合文學，1998年），頁238。

⁸² 見李敏勇：《戰後台灣文學反思》（台北：自立晚報，1994年），頁110-111，

⁸³ 參見陳芳明〈王禎和小說中的個人與國家〉，同注76，頁257。

⁸⁴ 陳映真在作品中借弟弟對哥哥的觀點說：「他變成了一個由理性、宗教和社會主義所合成的壯烈地失敗了的普羅米修斯神。」見〈故鄉〉，《陳映真作品集1》，頁40。

⁸⁵ 本篇作品廖咸浩認為陳映真以中間人的身分凸出與「中國」的牽連；見〈論陳映真〉，收於《從四 到九 年代 - 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頁172-173。施淑亦認為陳映真表現破滅的烏托邦意識與中國的破裂有關；見〈台灣的憂鬱〉，收於《兩岸文論集》，（台北：新地，1997年），頁161。林鎮山以此篇乃是對五、六 年代的慘白、困頓的自我放逐於現實生活的「被踐踏者」心靈告白。見〈再會「淒慘的無言的嘴」

弟弟代表「臺灣」，一切美好的如神話的哥哥終於墮落而不能自拔，弟弟一直吶喊我不要回家，我沒有家是暗喻對大陸的失望與歸不得，從這樣的角度則可理解哥哥在作品中的轉變與弟弟認同的挫敗。

（二）外省籍認同危機

在環境的鉅大變遷、政治的宰制、文學的斷裂中，外省籍作家也有另一種認同危機，白先勇在回顧《現代文學》創立的時代背景及其精神風貌時，提到當年他們面臨的處境：

我們正站在歷史發展的轉點上，面臨著文化轉形的十字路口，政府遷臺，經過十年慘淡經營，臺灣正開始從農業社會轉向工商社會，而戰後的新文化也在臺灣初度形成，我們在這股激變的洪流中，探索前進，而我們這一代，無論士農工商，其實都在參與建造一個戰後的新臺灣。⁸⁶

這種十字路口的徘徊，說明了六十年代是處於一個「新」、「舊」交替的轉型期社會，傳統與現代觀念重疊，雙重價值系統同時存在，社會出現「異質性」、「形式主義」、「重疊性」的特殊現象。⁸⁷而處在轉型期社會的人，社會學者冷納(Daniel Lerner)給予「過渡人」這樣一個概念，其展現的性格是：「他能『看』到別人看不到的事物，他生活在傳統者無法分享的幻想的世界裡。他的『態度』是一種慾望，他真正想看到他『心靈的眼睛』所看到的；真正想生活在他一直幻構

>，收於《台灣文學經點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1999年），頁131-132。

⁸⁶ 同注66，頁10。

⁸⁷ 「異質性」，如摩天高樓與木板小屋同時矗立在一條街上、西化主張與保守傳統派雜然並存，人們沒有共同的信仰；第二「形式主義」現象，則如政策與實際執行是兩回事，使改革徒具形式；第三是「重疊性」的特殊現象，即傳統與現代的結構並存，無法僅憑一種方式完成，譬如官僚的升遷是「專業」能力與靠「關係」來同時完成其目的。參見金耀基《從傳統到現代》，（台北：時報文化，1978年），頁124-128。

著的世界裡。」⁸⁸由於生活在雙重價值系統中，容易遭到價值轉換的困惑，即舊的道德觀念已瓦解，新的秩序尚在摸索中，造成「過渡人」內心的沮喪、徬徨與痛苦，而無所遵循的信仰危機。

從另一個角度探討認同危機，隨國民政府流亡台灣者，始終沉緬於故國鄉情，到處找尋與故居相似的山水，聊以慰藉鄉愁，例如台北街道名全來自大陸的縮小版本，彷彿置身在昔日的王國。白先勇在自述中也提到剛來台灣時，看看新居，肚裡不禁納罕，怎麼住進一個小茅屋子裡去？處處表現都是故國的優美、繁榮、好山好水，硬把台灣給比到邊陲地帶，不值一顧。盤據在內心的美好回憶，刻意把台灣當成客居，自己完全成了外來者，無視台灣存在的事實，或臺灣存在事實對他們而言是不具任何意義的，李歐梵曾說：

國民政府持以為統治基礎的政治號召 - 反攻大陸 - 加強了由大陸遷台人士過渡時期的感覺，也疏離了從未踏上大陸一步的台灣民眾。⁸⁹

白先勇〈永遠的尹雪艷〉中的尹公館，雖座落在台北都會，熙來人往，但卻是舊雨新知的聚會地，大陸時期的老朋友相聚談談老話，想一會兒當年，一腔懷古的幽情，尹雪艷成了大家訴鄉情的對象，好像尹雪艷是上海百樂門時代永遠的象徵，他們追逐的仍然是心中的鄉園。〈遊園驚夢〉裡台北近郊天母的寶公館，賓客雲集，滿座的衣裙明艷客人，散在寬大的廳堂，仿若錦簇繡叢般，這頭的賴夫人，那邊的余參軍長，無一不是大陸來台的故人，話當年的黃金歲月，票友仍圍繞著南京票戲時的風光與名角唱腔的評比；在南京梅園新村錢夫人的宴客款式怕不噪反了南京城，如今雖沒落了，一款杭綢料子雖舊了，但台灣的衣料粗糙，那裡及得上大陸貨的細緻；連大司務的料理，也非得上海名廚才燒的出講究的魚翅，賴夫人就說：「這是來到台灣頭一次吃到這麼講究的魚翅呢。」又如〈花橋榮記〉中的榮記老闆娘，隨時拿台灣與記憶中的桂林比較著，突顯

⁸⁸ 同上注，頁 129。

⁸⁹ 李歐梵：《浪漫之餘》（台北：時報文化，1981年），頁 55。

出台灣的不堪：「我們那裡，到處青的山，綠的水，人的眼睛也看亮了，皮膚也洗的細白了。幾時見過台北這種地方？今年颱風，明年地震，任你是個大美人胎子，也經不起這些風雨的折磨哪！」⁹⁰魂縈夢迴過去的種種美好，又附和著政府總有一天打倒萬惡共匪，收復山河的美麗神話，這種「過客」的心態，對生存之地 - 臺灣 - 毫無認同感，所造成的身分認同的失焦也是必然的。

六年代的作家在信仰危機中又因受到西方文化的衝擊，面臨找不到「認同」的對象，「自我認同」膠著於新／舊、中／西之間，這認同危機產生，在白先勇《現代文學》重刊之前的一段回憶可以看到他們的困惑：

《現代文學》創刊的成員背景相當複雜多元...我們雖然背景各異，但卻有一個重要的共同點，我們都是戰後成長的一代，面臨著一個大亂之後曙光未明充滿了變數的新世界。外省子弟的困境在於：大陸上的歷史功過，我們不負任何責任，因為我們都尚在童年，而大陸失敗的悲劇後果，我們卻必須與我們的父兄輩共同擔當。事實上我們父兄輩在大陸建立的那個舊世界早已瓦解崩潰了，我們跟那個早已消失只存在記憶與傳說中的舊世界已經無法認同，我們一方面在父兄的庇蔭下得以成長，但另一方面我們又必得掙脫父兄扣在我們身上的那一套舊世界帶過來的價值觀以求人格與思想的獨立。艾力克生（Erik Erikson）所謂的「認同危機」（Identity Crisis）我們那時是相當嚴重的。而本省同學亦有相當的問題，他們父兄的那個日據時代也早已一去不返，他們所受的中文教育與他們父兄所受的日式教育截然不同，他們也在掙扎建立一個政治與文化的新認同。⁹¹

說明了在六年代的轉折期，不論外省或本省作家共同面臨了認同的危機及焦慮。由於無法認同政治體制，作家採取消極抵抗的流亡方式，表達無言抗議。

⁹⁰ 白先勇〈花橋榮記〉，《現代文學》第42期，頁121，

⁹¹ 同注66，頁9-10。

於是我們可以在六十年代作品中看到吶喊、追問生命存在意義所展現驚心動魄的死亡省思，這些與生命毀滅或死亡超越的主題相扣的作品，具體反映了台灣作家心靈的流亡現象。

三、成長痕跡

政治的壓力迫使知識分子與現實的社會脫離，充滿無力感，於是文學的焦點由「政治」過渡到「人」的身上，以悲憫的情懷關注人類心靈的憂傷。從「無根」的失落、「放逐」的困境思想中，呈現最多的死亡，乃在於不斷追尋自我存在意義及解放心靈自由中，發現人的悲劇性，而努力掙扎在生命邊緣的過程裡，更多的是被翻開的記憶，那是一路走來的失序社會的干擾。根據心理學家的研究，一個人在青少年成長時期的人生經驗，常成為其創作的題材，並且是最具生命力的部分。因此，從流離失所的經歷，看到白先勇《台北人》系列小說的人生幻滅無常，對時間流逝的敏感，白先勇提到作品中對時間的敏感來自家庭環境：

我們家是一個大家庭，父親從前是軍人，母親也出身於官宦之家。我們家與國民黨的關係很密切，家運隨著黨運而起伏。我是在抗戰中出生的，可以說是生於憂患吧。十一、二歲時從大陸到香港再到台灣，從一個世界跑到另一世界。我那時剛開始了解周遭的人和事物，但童年時代認識世界的依據一下子就改變了，我在自己心目中所建立的世界剛開始就毀滅了。目睹人事變幻得那般迅速，令我產生了一種人生幻滅無常的感覺。⁹²

歐陽子也認為《台北人》講的都是「今昔對比」的感傷，過去的是「新生」，現在的是「死亡」。⁹³顯赫的家世，集權勢富貴於一身的白將軍府邸，繁華過盡，亂世中卑微的生命似落葉輕輕飄零在不該死去的年紀；幼時肺癆一病四年，性

⁹² 蔡克健〈訪問白先勇〉收於白先勇：《第六隻手指》（台北：爾雅，1995年），頁449-450。

⁹³ 見《王謝堂前的燕子》（台北：爾雅，1978年），頁9。

格轉變的敏感內向，兵荒馬亂的成長歲月，流亡的種種是白先勇揮之不去的沉重記憶，而形成他筆下感傷色彩及濃郁悲劇意識的死亡描寫。

幼年成長環境的影響，在七等生的身上也可以找到痕跡。七等生童年時家境的困頓，父親早逝對他的影響：

因為時代的陰影，造成年幼的我與我父有些敵意和疏遠。他在我記憶的黑幕中顯現的是一個憂患的形體，他高瘦的身軀和臉上痛苦的眼神，以及他在病魔的纏繞之下的掙扎扭曲的情態，我常常為此而逃到無人的角隅去獨泣。⁹⁴

父親形象上的晦暗，帶給他自我認定的困難。貧窮帶給他心靈上的壓力，求學過程的叛逆與受到歧視，讓他對人生的不完美有了更早的體會，孤獨的心與世界保持著距離，企圖在自我追尋中完成自己，這是七等生創作的目的。⁹⁵

作品上使用的隱晦曲折手法，記錄著七等生自我的投影，面對存在的荒謬，在現況中做選擇，呂正惠就認為七等生是以自己艱困的經歷為基礎，在小說裡塑造一種具有病態傾向的人格類型，⁹⁶七等生的小說人物總是無法順利的在現實中生活，總是與生存的社會格格不入，得透過一種挑戰與嘲弄的結局，來肯定自己（如〈讚賞〉的阿兵哥），來獲得自由（如〈綢絲綠巾〉的費木奴），來發掘真實的靈魂（如〈我愛黑眼珠〉的李龍第），在「理想世界」與「現實世界」的衝突互動裡呈現七等生探求生命哲學的困頓，建構個人的道德標準下，追求人性的本真，他鄙視在洪水來臨時踐踏別人以求生的窘狀，勇於面對死亡之境，方能獲得真正的自由的超越。

陳映真在六十年代的作品中的憂悒而蒼白的色調，與其養父去世，家道中落的青少年感傷有著根源關係。陳映真歸類自己是處於社會中間地位的市鎮小知識份子作家，而這樣的身分在現代社會的層級結構中，當景氣良好，出路很

⁹⁴ 七等生〈我年輕的時候〉，《七等生作品集 9》（台北：遠景，1986年），頁 250。

⁹⁵ 見〈「當代文學面對社會」座談會〉，《聯合文學》77年1月第39期，頁32。

⁹⁶ 呂正惠：《小說與社會》（台北：聯經，1988年），頁110-111。

多的時候，很容易向上爬升，從社會的上層得到不薄的利益。但在景氣阻礙時，他們不得不向下沉淪，顯現沮喪、悲憤、徬徨的情緒。⁹⁷這是陳映真早期呈現的濃厚傷懷意識。因此他有比別人更加敏銳的眼睛去洞悉社會歷史的轉折，懷抱一種浪漫人道主義關懷及烏托邦的社會意識，以投身於革新舊社會的頹壞。李歐梵是這樣形容陳映真的：

他既寫實又浪漫，既有極強的意識型態，又有濃郁的頹廢情操，既鄉土又現代，既能展望將來又往往沉緬於過去，對人生既有希望又感絕望，對於社會既願承擔，但也在承擔的過程中感到某種心靈的無奈。⁹⁸

但空有理想的小知識份子，不斷在試煉過程，面對自身內心情慾和社會現實後終於敗陣下來。烏托邦的幻滅來自環境與個人的對立衝突，當理想與現實碰觸後產生的幻滅，主人公不可避免的踏上死亡與墮落的境地，〈我的弟弟康雄〉中的康雄是如此；〈鄉村的教師〉中的吳錦翔也不例外；而〈加略人猶大的故事〉中的猶大出賣耶穌來喚起革命的失敗，也只有走上自殺一途。岡崎郁子就認為陳映真在追求一個理想的終極所面對的死亡是：理想 虛無 絕望 死（自殺）的形式。⁹⁹陳映真即由探討生與死的關係，來剖析人在社會中的處境，透過「死亡」以顯現理想的失落。

陳映真受其生父的傳道人信仰影響，在高中時期成了一個誠摯、熱心的基督徒，充滿愛心與道德意識的個性，以一種接近宗教的情感去關懷撫慰最黑暗的事務。陳映真自述初中的生活是在白色的、慌茫的歲月中度過，他記得小學

⁹⁷ 陳映真在剖析自己早期作品的蒼白慘綠色調的根源，即來自家道遽爾中落留下深刻的烙印。

陳映真〈試論陳映真〉，收於《孤兒的歷史，歷史的孤兒》（台北：遠景，1984年），頁163-169。

⁹⁸ 見李歐梵：《中西文學的徊想》（台北：遠景，1987年），序言。

⁹⁹ 岡崎郁子：〈台灣文學的現實 - 關於陳映真〉收於《陳映真作品集 15》（台北：人間，1988年），頁103。

五年級的吳老師在半夜被軍用吉普車帶走；冬天住後院的陸家兄妹分別在鶯鎮和台南被帶走；台北火車站的大告示上的名單，總是用朱墨打著令人膽戰的大勾，人群中失聲而癱倒在地的人必是在名單中瞥見了親人。這樣的記憶，及至開始創作，在反共偵探和反共恐怖的天羅地網中，思想、知識和情感日增的激進化，使他年輕的心中充滿著激忿、焦慮和孤獨。¹⁰⁰他同時又是一位內省力很強的作家，當道德的自覺而產生罪孽感只有自死亡中超越，或以死亡來逃避內心的譴責，以「死滅」銘刻沉痛的記憶。¹⁰¹

施叔青成長於曾經是繁華的台灣第二大城，「一府、二鹿、三艋舺」的鹿港古城，人文薈萃，政經發達的通商港岸，在時空的推演輾轉下，漸趨沒落。斑駁深鎖的宅院，晦暗曲折的長巷，鄉俗野譚的神秘故事，保守因襲的傳統觀念，宗教禁忌的宿命，匯聚成施叔青童年記憶。在施叔青半自傳性的散文體小說〈那些不毛的日子〉即是其童年生活的片段紀錄。那「宮口 - 小社會」中的鄉俗，流轉著鄉土人物：無聲無息死去的源嬭、沒落的大戶人家施水泉及賣唱的「猴玉」、信基督賣野藥的吞劍江湖藝人、豬一般的小眼睛老鴛罔腰與她的白痴女兒、當乩童的二伯父、愛說鬼故事的林木榮和得了脫皮症的女兒等等，這些人及發生在他們身上的民俗故事，被誇張及改寫為鬼魅陰暗、光怪陸離的「荒原」作品。白先勇即認為：「施叔青的小說，背景不一定是在鹿港，但必是與鹿港相似的一些『荒原』，這些荒原，遠離都市，不受文明力量的左右，因為只有在這荒原上，死亡 - 性 - 瘋癲的力量才能發出最大的原始性的威力」。¹⁰²從童年經驗鋪陳最多的是與死亡及鬼魅有關的情節，施叔青曾說：「當年的她，是個被故鄉神秘的氛圍所魘住了的女孩，唯一逃離的方式，就只有借用文字來吐訴我的驚

¹⁰⁰ 許南村〈後街 - 陳映真的創作歷程〉收於楊澤編《從四十年代到酒年代兩岸三邊華文小說研討會論文集》（台北：時報文化，1994年），頁150-154。

¹⁰¹ 林鎮山〈再會「淒慘的無言的嘴」〉收於陳義芝編《台灣文學經典研討會論文集》（台北：聯經，1989年），頁145。

¹⁰² 見施叔青：《約伯的末裔》白先勇序言（台北：仙人掌，1969年），頁8。

影響施叔青創作的除了童年生活經驗，她同時受其胞姊施淑給予的現代觀念，在兩種對立衝突的文化撞擊下，蘊積其內在創作力。而當親自投入大都會生活後，現代主義的學習融合過去的經驗世界，呈現鬼魅不安的、瘋狂的、囁語般的夢魘作品，尤其六十年代的早期作品，皆有一種超現實的、人鬼不分、五毒橫行、殘缺的世界，來折射人倫、道德、理性的不存在。白先勇認為：「死亡、性和瘋癲是施叔青小說中循環不息的主題」，而且其表現的人物都是「肉體上、心靈上或精神上受過著斷傷的畸人」，¹⁰⁴在她的世界，彷彿是著魔的精神分裂症，經常瀰漫著一種卡夫卡式的夢魘氣氛。

這些奇異的世界從表現個人夢魘與心理風暴的〈壁虎〉、〈凌遲的抑束〉、〈瓷觀音〉、〈約伯的末裔〉等作品中可以看到少女對「性」毀滅力量的洞悉，〈壁虎〉裡「嫂嫂的身體像淫猥的壁虎」，以壁虎為性的化身，並成為少女的惡夢：「一張灰色的大網，網內有二十、三十無數隻灰褐斑紋壁虎竄跳著。突然牠們一隻隻斷了腿、尾巴、前肢，紛紛由網底落下，灑滿我整個的臉、身子，我沉沉地陷下去，陷下去，陷於屍身之中」，表現死亡與性的糾纏。施叔青並用極為噁心的動物如蝙蝠，〈凌遲的抑束〉中介於陰陽的世界，幻化成外祖母屍體的臉上現出大蝙蝠黑影；祖母般女人突一歪身，竟倒進香爐裡，一陣屍臭。猛定神，才知又是盲眼的老鼠，爬入鑄鐵的火坑，屍身焚燒起來；小妹死了以後，發起發的母親，整日在閣樓上縫著小白人，那些布人臉上被母親用黑墨畫上一隻大蝙蝠的分裂幻象。〈約伯的末裔〉老吉的女人，出現在臉上的疤痕，竟描寫為像一隻紫紅色的蜈蚣；〈瓷觀音〉中母親經年的詛咒，瘋了又好，好了又瘋的主角李潔，在病好了以後，準備作五月新娘，等待她的是「未婚夫那隻假手發亮地伸縮在李潔鼻尖一帶」的陰影。從以上作品可以看出施叔青小說人物的孤絕與切斷溝通的彷彿生活於另一個世界，是恐怖、是幻想、是對著死神的喃喃自語與挑戰。

¹⁰³見施叔青：《那些不毛的日子，後記》（台北：洪範，1988年）。

¹⁰⁴同注102，頁2-4。

台灣本土作家面對同樣苦悶的時代環境，不似來台第二代作家對台灣民眾的生活與現實採以「疏離」方式，反而以貼近台灣土地和人民的方式深耕台灣文學，創作上亦嚐試具有意識流或存在主義風格的作品，相對於六十年代初期白先勇創辦的《現代文學》，一九六四年吳濁流創刊了《台灣文藝》，主張反映人生，重視鄉土色彩的寫實文學，呼籲作家應把握台灣的特殊性、現實性，作品根植在台灣這塊土地上。「因此《台灣文藝》的根，紮在台灣歷史的、文化的、社會的、民眾的風土。」¹⁰⁵以灌溉台灣本土文學的「文化沙漠」，¹⁰⁶並且承續了台灣新文學的傳統，結合日據時代作家龍瑛宗、張文環、王詩琅等及戰後作家鄭清文、張彥勳、黃春明、王禎和等等，以填補台灣文學斷層的鴻溝。

台灣本土作家在死亡主題上著墨較少，分析言之，一方面是台灣人的特殊性格使然，那種反抗精神的表現，正如吳濁流先生的觀察：

台灣人是由台灣的歷史與環境培養出來的，有其特異性。台灣人的祖先當然是漢民族，他們不是每次北方的異族入侵時抵抗到最後逃到南方來的，便是不服異族統治而南遷的...台灣在這三百年來差不多都是在從事抗爭。¹⁰⁷

反抗意識的形成，是披荊斬棘血淚交織的漫漫長夜，對於巨大的命運力量的承受，是台灣人在傳統社會組織變動緩慢情況下，自然養成的知命、認命的習性，它常成為超越時空而存在的意識型態，也是一種民族文化心理結構的積澱。¹⁰⁸這種抗壓的韌性表現在被殖民的屈辱、白色恐怖的陰影裡，但卻從不肯放棄作為一個台灣人的尊嚴，在宿命論下，以意志與命運搏鬥，呈現較光明的希望如「天

¹⁰⁵ 同注 3，頁 117。

¹⁰⁶ 此語是吳濁流先生在《台灣文藝》創刊號提出的台灣文學境況。

¹⁰⁷ 吳濁流：《黎明前的台灣》（台北：遠景，1977年），頁 111。

¹⁰⁸ 李豐楙〈台灣鄉土小說中的社會變遷意識 - 60、70年代鄉土小說的主題：貧窮、命運與人性〉收入於龔鵬程編《台灣的社會與文學》（台北：東大，1995年）頁 173。

無絕人之路」或「一枝草一點露」的絕處逢生結局。另一方面不以死亡作為末路，也因為《台灣文藝》倡導重視鄉土，根植台灣土地的呼籲，使得在台灣一連串快速變遷中成長的王禎和、黃春明、張彥勳等等作家，從生活的經驗中取材，或以浪漫式的懷鄉溫情主義，或以救贖的使命感，探討處在社會轉型當中，人與人，人與自然和諧關係遭到破壞與挑戰的社會現象，對既熟悉又親切的小人物命運投以更深切的關懷與描寫。